

第一章

理论启示：地缘政治与战略运用

地缘政治又称地理政治，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潘恩的人权论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学说一道被西方学者视为改变世界的理论。与古代以局部地理区域为中心的部分国家或者同一国家内不同诸侯国之间相互斗争时将地理与政治、军事相结合的思想不同，地缘政治基本理论主要产生于 19 世纪中后期，发展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达于冷战期间及冷战结束后，是人类历史进入全球政治时代后重要国际政治理论之一。当代地缘政治理论主要由海权论、陆权论和空权论三大理论体系演变而来。其中，海权论和陆权论几乎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的国际政治斗争，而空权论则从立体空间角度将人们对地缘政治认识推向天空和更为遥远的太空。地缘政治理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视野。运用地缘政治理论为实现国家利益而形成的以地理空间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思想和战略设计便产生了地缘战略。地缘战略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透视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通过战略、政策的努力为本国政治、经济以及安全等多领域发展创造理想的地理条件的战略。地缘战略是地缘政治理论的动态运用。

一、陆权理论的意义

作为地缘政治的核心理论，陆权思想一开始就超越了中世纪和近代国家间斗争的狭隘的区域地理范畴，陆权思想的着眼点在于从“全球政治地图”中判别掌握全球战略的关键点。由于陆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与海权理论和空权理论相比，陆权理论的发展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最为明显。从思想基本内容看，陆权理论包括“心脏地带说”“边缘地带说”“生存空间论”等主要思想内容。

1.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

“心脏地带说”是陆权理论最早和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其理论提出者是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特·丁·麦金德爵士（Sir Halfa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麦金德的理论与其他陆权理论的支持者一样，最初的思想也集中于陆权与海权的战略优势对比分析方面。1887年和1904年，麦金德先后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2篇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表述了“心脏地带说”的基本思想。

《历史的地理枢纽》是麦金德地缘政治思想的雏形。在这部对“心脏地带说”甚至陆权理论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中，麦金德根据当时世界列强争夺殖民地斗争的现实指出，世界的征服者不外乎凭借陆地或者海洋。比较依托陆地或海洋的这两个不同征服者的优劣，麦金德认为，“陆地是海上力量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陆地资源、丰富而安全的生产基地以及为航海而提供的一切陆地服务是支撑对海洋控制的坚强后盾”。“离开陆

地，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扩张性将不复存在。海上力量由于基地被陆上力量所控制而不断被征服的历史说明，陆上力量控制海上力量较之海上力量控制陆上力量容易得多”。“欧洲依靠海上力量向外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由于海上力量不可能深入大陆腹地，陆权拥有反对海权的不断增长的战略机遇。”^[1]

麦金德认为，世界边界的封闭性创造出一种新的地理视野。全球可以被想像成一个被海洋覆盖着的，由欧洲、亚洲和非洲三洲组成的“世界岛”和南北美洲及其他小岛组成的图景。由于陆地通讯和交通的发展，“世界岛”被统一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单位。“世界岛”的核心是由主要大河流域形成的广阔的地域，这一区域包括亚洲的中西部和欧洲的东部。“世界岛”的核心地区可以被称为“枢纽地区”，是海上力量难以到达的地方。“枢纽地区”的东面、南面、西面是巨大的新月形的边缘地带，由海路可以到达。

陆权和海权优劣的对比在麦金德的思想中主要集中在它们各自机动性的对比。麦金德指出，历史上，海洋的机动性和陆地的机动性不断发生着冲突，其结果首先出现了大河文明，而后是航海能力和制海权。然而，“当西欧的航海民族以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大陆边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区变成属地时，俄国……格萨克骑兵席卷了亚洲，向东猛扑，差不多和绕过好望角一样孕育着巨大的政治后果。”^[2]横穿大陆的铁路完全改变了陆地缺乏机动性的状况，而这最终将使陆地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

按照麦金德的设想，在枢纽地区的外围分别是内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其中内新月形地带由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组成，外新月形地带由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构成。在麦金德看来，19世纪末期英国凭借海上力量获得的海上霸权，进而世界的霸权，远远没有抓住世界地缘政治的关键所在。只有掌握世界“枢纽地区”的权

力才能把握世界权力的分配。攫取世界“枢纽地区”的陆权，依托欧亚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海上劲旅，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帝国。如果“德国和俄国结盟”或者“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其领土”，丰富的陆地资源和控制海洋的优势地位将有利地结合起来，将产生一个强大的能够威胁世界的帝国。^[3]陆权强国将是世界霸权的最终掌握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据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麦金德进一步修正了 1904 年的学说，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他关于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在这部书中，麦金德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心脏地带说”。麦金德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是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对抗。虽然战争的结果以海洋强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如果将来的某个时期整个“世界岛”或者其中一部分统一于一个单一势力手中，这一势力将不仅是一个陆上强国，而且也将建立一支无敌的海上舰队，成为海上强国。从战略上讲，这种情况将构成对自由世界最严重的威胁。因此，海上强国兴衰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能够独霸海洋，而在于能否处理好自身的陆地基地和陆上强国的基地之间的关系^[4]。认识到这一点，并在新的制度中设法防止可能的漏洞是战略的关键所在。

为了从地缘政治角度论证相应的战略思路，麦金德进一步细化了他关于“心脏地带”的论述。他在“世界岛”的范围内界定出 2 个“心脏地带”，即，“北心脏地带”和“南心脏地带”。其中，“北心脏地带”大致指北起西伯利亚的海岸直到俾鲁兹斯坦（Baluchistan）和波斯湾一线及周边地带^[5]，“南心脏地带”则主要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为了强调“心脏地带”的重要性，麦金德曾用这样的语言概括他的理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统治‘心脏地带’；谁统治了

‘心脏地带’，谁就能统治‘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全世界。”^[6]运用“心脏地带”学说分析欧洲历史，麦金德认为，19世纪欧洲国家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证明，“世界岛”和“心脏地带”是海上强国和陆上强国的终极“地理现实”。俄罗斯和德国对“心脏地带”优势不可小视，要尽可能防止这两个国家之间出现结盟，避免在国际格局的转换过程中，世界“心脏地带”落入某个单一势力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金德应《外交》季刊之约撰写了一篇题为《全世界与赢得和平》的文章中，更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地缘政治思想，并对二战的进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麦金德指出，二战后果不外乎两种结果：要么法西斯德国征服整个欧洲；要么苏联及其盟国战胜法西斯德国。但是，无论哪种情形都与他的理论有基本一致的意义。那就是“心脏地带”理论对于战后世界秩序的价值。面对战争，麦金德指出，要彻底摧毁德国的战争哲学必须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净化德国人的头脑。这种净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某些再生体或者某些正在再生的德意志根源，而是来自于“心脏地带”和美国、英国、法国共同构成的权力堤坝之内。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任何破坏和平的力量受控于两道有力的权力堤坝——位于东方“心脏地带”的‘陆权’和西方北大西洋地区的‘海权’，的共同压力^[7]。而一旦“德国同时卷入一场同‘陆权’国家俄国和由美国领导的‘海权’国家的军事冲突，德国的生存将是极其危险的。”^[8]战争的后果也不言自明。对于战后形势，麦金德预言道：战后欧亚大陆的“陆权”强国同“海权”的边缘地带帝国之间的对抗将不可避免^[9]。由于苏联基本占据着广袤的世界“心脏地带”，“如果苏联在这次战争中以德国战胜者的身份出现，它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陆上强国，并且是拥有最强防御条件的世界强国。因为心脏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工事，而在这里历史上首次驻扎了足够数量和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10]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使用了尽可能简单的论点来阐释复杂的地缘政治理论，他的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二战后的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战后英、美等国的许多全球战略都浮现过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的痕迹。

2. 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说”

与麦金德同一时期的另一位陆权主义者是美国的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 1895—1943)。斯派克曼在其代表作《和平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一书中提出了自己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思想——“边缘地带”说。斯派克曼的地缘政治学说和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一样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陆权和海权的对抗。斯派克曼也按照地缘政治原则对全球地理区位进行了划分。他把地缘政治区位划分为全球性的位置和区域性的位置两种。根据气候带、海陆分布等条件将世界性的位置划分为内陆、岛屿、边缘三种，并根据邻国间的相对关系和实力地位将区域性位置划分为较强、相当、较弱三种。但是与麦金德观点不同，根据对各种位置的比较分析，斯派克曼指出，对海权国家构成威胁最大的不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是位于心脏地带和西方势力范围控制的沿海地带之间的中间地带。他断言，中间地带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将不断上升，并成为统治沿海地带的关键地区（这一地带大致等同于麦金德所谓的“内新月形地带”）。^[11]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处于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冲突中起着“一个广大的缓冲地带”的作用。由于这一地带面对海陆两面，同时具有海陆双重性质，应该成为世界强国占领和控制的核心地区。因而，“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应当受到战略制定者的重视”^[12]，“谁控制了边缘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能决定世界的命运”^[13]。

相对于麦金德，斯派克曼的地缘政治思想有着更多战略的

意味。他的地缘政治理论更多地强调美国如何利用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建立强权政治，实现世界霸权。他强调“没有武力支持的政治理想和远见似乎很少有存在的价值，西方的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和保持，都应当归功于自身及其盟国有效地使用武力”^[14]。他建议美国应当注重构建均势体系，并确保自身在均势体系中的平衡者地位。为此，美国必须保持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优势地位。^[15]

斯派克曼的地缘政治分析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为美国二战后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政治的一种战略准备。对于美国国际战略的发生转变后的现实情景提供了战略选择的依据。美国二战后在全球的地缘战略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斯派克曼的理论。

虽然当代学者谈及地缘政治时多像笔者一样，更喜欢以英、美学者为中心展开，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德国学者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的确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和军国主义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为学术研究的地缘政治和作为国策基础的国家地缘战略追求之间难以绝对划清的界限。地缘政治、国家利益、战略追求、地缘战略设计几乎形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序列，地缘政治基础理论在国策使用中的偏差最终使德国地缘政治学派成为反人类的历史罪孽。

德国地缘政治学派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是豪斯霍弗。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理论主要继承了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弗里得里西·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和 H·J·麦金德等人的理论。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理论并没有像以前的学者一样，将主要的精力用于构建一种地缘政治分析框架，而是更多地谋求一套适应国家增长理论的地缘政治陪衬。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研究比较偏重于军事扩张领域。他通过对日本和英国等国家的案例分析，指出日本边界扩张和自身强大存在密切

关系，英帝国的辉煌并不在于欧洲，而是在于英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成就。豪斯霍弗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根源在于国家领袖以及军事领导人战略和军事计划的失败。如果德国能够控制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并同俄罗斯结盟，胜利自然将属于德国。从而，“把国家的力量同各种地理要素结合起来，收集有关的地理资料为纳粹的扩张与侵略提供宣传的理论依据”成为豪斯霍弗及其追随者地缘政治研究的主要目标。^[16]

豪斯霍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国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因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的有限，领土范围内的土地所能够供给的自然资源同样有限。德国也是这样。人口过剩将导致经济危机和灾荒。为此，必须消灭人口与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17]为此，德国地缘政治学派提出要谋求足够的“生存空间”，即：获得足以供养一个国家人口的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的现实，宣称一个国家的空间扩张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豪斯霍弗认为，德国的目标是强大到可以接管泛美和泛亚地区，通过控制世界“心脏地带”，获得控制世界陆地的权力，并且夺取海上霸权。

为了实现帝国生存空间的扩张，豪斯霍弗提出了德国地缘战略扩张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要控制心脏地带，实现对欧亚大陆的控制；第二步，从“心脏地带”向外延伸德国的权力，实现对包括日本、英国等海上强国在内的“内新月形地带”的统治；第三步，进一步向外扩张德国的统治范围，夺取“外新月形地带”的控制权，最终实现全球霸权。

因为豪斯霍弗的“生存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扩张主义政策几乎异曲同工，而德国法西斯也正是借用了“生存空间”的概念和其他地缘政治思想为扩张政策作宣传，豪斯霍弗的理论一度几乎被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经常被贯以“臭名昭著”之类

的修饰语。不仅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学者甚至对地缘政治表达了“地理学与政治学的任何结合都必将导致战争和征服”的看法，甚至对地缘政治一词也感到极其厌恶。^[18]然而，地缘政治思想和地缘政治所体现的战略原则，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方面的意义并没有因此而终结。二战后、冷战期间乃至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都或明或暗地显现着地缘政治，甚至豪斯霍弗地缘政治理论的思想。只不过“安全空间”或“利益空间”等现代流行的提法掩盖了过去过于直白的“生存空间”给人们带来的历史伤痛。

以上三种理论是二战以前陆权理论的典型代表，其中“心脏地带说”和“边缘地带说”通过地缘政治分析分别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导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的观点。虽然无论麦金德还是斯派克曼都没有明确他们理论的服务对象，但是现实表明他们的理论最终是世界强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有力理论武器。²⁰ 世纪后期直到现在，科技的发展和世界政治与经济联系的深化将世界各国都淹没在一个整体的国际体系之中，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确是主流。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国际体系运转过程中的现实事物。通过掌控关键的地缘战略带，形成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控制，甚至借助特定的地缘战略手段制造对敌对或竞争对手国家的战略压力是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战略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说只是在现时历史进程中才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德国的侵略扩张和种族灭绝给人类带来了重大的灾难，也给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派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然而，豪斯霍弗地缘政治理论的幽魂仍然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领域肆意游荡。无论是美国这样的一流强国，还是日本这样正在走向军事大国尚未问鼎世界政治大国的国家，“生存空间”理论的基本理念在其国策中的确有着相当的影响。否则，美国不会在全球范围内都拥有广泛的战略利益，

而日本也不会将“周边有事”的地理范围扩大到包括其他国家领土主权范围在内的程度。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今世界，实力与一个国家地理范围的控制欲望之间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不过现在这些欲望的表达方式相对文明或者相对隐蔽，不像历史上赤裸裸的血腥侵略那样让人敏感而已。

二、海权思想的内涵

与学说众多的陆权理论相比，海权论的学说相对单一。海权论最早是由美国海军史学家阿尔弗莱德·塞·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提出的。马汉的海权理论是海权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于马汉研究海权的出发点集中于如何建立更有效的海军战略，因而其理论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基于地理因素探讨海军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马汉一生关于海权和海军战略的论著相当多，但是与麦金德等人不同，马汉并没有将他的许多地缘政治思想和战略原则归纳成某种直观而简洁的特定公式。虽然有些学者认为，马汉海权论的公式可以概括为：谁控制了世界重要的海峡，谁就控制了海洋；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全世界。但是综观马汉的学术著作，尽管这种看法并没有根据，但是却有挂一漏万之嫌。作为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马汉对美国海权、美国地缘战略安全的思考，其实具有更多的借鉴意义。

马汉对海权的关注和相关理论的阐述主要来源于他对历史的考察。马汉海权思想产生的时代正值世界航海技术发生重大飞跃的时代。木帆船被钢铁轮船迅速淘汰，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正面临新兴殖民国家崛起的压力是当时典型的时代特点。美国是 19 世纪迅速崛起的国家之一。如何面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如何在美国以外的地区辨别并争取本国的地缘政治

利益成为美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马汉的海权理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虽然马汉的海权思想在许多方面是海洋国家和濒海国家可以共同借鉴的理论，但是他在思考和写作相关海权论著的时候，更多地目的在于激励美国关注海洋，重视海权。马汉的海权理论综合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海权国家的条件，海权发展的条件，美国海权产生和发展的条件。笔者认为在马汉的所有著作中其实隐含着几条特殊的线索，那就是论证美国必须成为一个海权强国，美国如何成为一个海权强国，美国实现海权强国应当注意哪些目标，为实现目标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方向等。

在马汉最早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他列举并举例分析了实现海权、成为海上强国的 6 个基本条件，即，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素质、政府性质等。他认为，发展海权必须拥有在地理上进入海洋的便利，并且最好没有陆地安全的威胁，国家政策也不选择通过陆地扩张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扩张。岛国和濒海国家都具有发展海权的条件。历史表明这类国家有更多地发展海权体系的渴望和压力，岛国尤其是这样。具备地理条件之外，一个国家还必须具有走向海洋的冲动。这种冲动主要来自于其内在的经济特征。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即便是典型的海洋国家也往往因为对海外商业竞争的漠不关心或者沦为殖民地而失去对海权的兴趣。当一个国家具备了走向海洋的动力，并且在地理条件方面拥有沟通内地和通向远洋的众多港口的水陆交通，才可以进一步向海权迈进。领土范围、领土范围内人口的分布特征、整个民族对海外商业利益的渴望和需求也影响着一个国家对海权的追求。最后马汉还指出，政府是发展海外力量的关键，也是海权实现的根本动力或者障碍。^[19]

马汉生活的时代，英国虽然开始面临着各种竞争的压力，

但是作为世界工厂和拥有最广阔殖民地的国家，英国的霸权地位和强大的海权仍然给马汉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通过对英国的分析，马汉认为英国的繁盛在于广大的殖民地为它提供的工业发展所必需的丰富的资源和广大的市场。因此，获得制海权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至关重要的条件，而国家战略政策的追求应当将实现制海权作为重要目标。海权和国家力量的相得益彰、互相促进是马汉看待海权的一个重要观点。^[20]

在马汉的眼中，海洋的威胁不断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战胜海洋能力的提高而降低。伴随着人类的进步，海洋日益成为拥有海上实力，并且渴望世界财富的那些国家进行竞争甚至发生冲突的主要领域。人类对海洋的兴趣主要来自于海外贸易所带来的财富。因而，一个国家的生产水平和对外贸易的意愿及能力将成为海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由于海外贸易离不开强大的海上运输能力，国家海权增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以扩大海上运输能力为核心发展其他辅助设施，并且使得这些发展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进而使海运能力的增长、国家财富的增长为海权的产生奠定基础。在国内巩固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之后，一个国家还要在全球范围内，在国家商业利益延伸所及的范围内控制关键的地理位置——基地，以夺取本国急需的原料和能源以及市场同样成为海权发展的关键点。^[21]

虽然马汉海权论在多个角度论述了一个国家走向海洋争夺海权的根本动力与其自身的经济特征等因素极为重要的关系，但是作为海军将领，马汉更多地关注这种动力实现过程的军事和安全因素。马汉看来，即便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并且拥有在基地和殖民地之间航行的强大的海上运输能力，但是由于海运是一种暴露的交通体系，这种体系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因此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来保护本国基地、海外基地和本国殖民地之间交通线的安全。在世界殖民主义风行的年代，

商业竞争与国家扩张性之间的特定关联使武装冲突成为日常规律。马汉指出，海权的运用并不等于海洋的和平，海权的增长本身是一种竞争中的发展，海军是海权最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海军不仅是海权体系得以完整保持和正常运转的保障，而且还可以通过战争使对方失去海上运输能力，并破坏其海权体系。从而，海军的战略任务不仅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本国的海权，而且作为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还是向海外拓展国家利益、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22]。

马汉的海权论在整个分析和论述过程中细腻而含蓄，虽然有些学者并不赞赏他通过特定案例分析而得出战略原则和结论的研究方法，但是马汉将军事安全和地理有效结合而生成的海权理论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特定的意义。马汉的理论特别强调海军力量的重要性和海军战略的科学设定及有效运用。马汉的海权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以海洋控制权为目的的海军战略理论。这些理论在马汉论述相关美国的海军战略以及海权战略的过程中表现的得尤为突出。

与马汉对海权的定义略有差异，当今学者对海权的定义更喜欢从国际法角度出发，认定海权（Sea Power），即“海洋空间活动的自由权”。^[23]在国际法范畴，海权包含狭义和广义两层涵义。狭义的海权指“国际法赋予的一个国家对本国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海域上部大气空间的管辖、控制权和在受他国武力攻击、蓄意侵占时的自卫权，以及对待他国在海域违反国际法和本国法律时的裁决权”。^[24]广义上的海权还包括“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公海、国际海底区域自由航行、开发利用的权利”。^[25]然而，国际法并不能够完全解决当今世界国际政治领域的全部问题。虽然有关国际法条款规定，公海、国际海底区域均不得成为一国领土取得的对象，^[26]但是由于当今世界各国实力的差异，各国对国际公共海域的开发能力千差万别，一些拥有实力的国家实际上仍然掌控着公海的航行和开

发权。现实情形仍如马汉在其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年》引论中指出的那样，“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得的好处超越寻常的份额，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令条令的和平方式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能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27]

在马汉看来，海权的实现包含着特定的竞争内涵，实力是海权的基础。一个国家应当寻求支撑“海上实力发展的基本要素”，^[28]建立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并通过占有或者夺取有利的地理位置实现海军战略的有效运用，以最终实现海洋控制权。海权实现的关键在于海军战略和配合海军战略发挥战略效力的地理条件。^[29]

马汉指出：“海军战略的最终目的就是既在和平时期也在战争时期奠定、维护和增强国家的海权。”^[30]海权的生成对海军有天然的依赖，一个国家的海权状况是其海军战略的直接结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根本无法实现控制特定海洋区域或全部海洋的目标，甚至也无法阻止其它敌对势力通过特定海洋区域对自己发起的攻势或者封锁。然而，海军是海军战略的产物，不同的海军战略决定着海军的特征。

界定海军战略首先要区分“攻势战略”和“守势战略”。^[31]对守势战略进一步细分又可以分为“狭义的海岸防御战略”和“相对积极的海上防御战略”。狭义的海岸防御战略是一种强调防卫本土的战略，军事活动“仅限于击退直接的进攻”，防守“主要由陆军负责”；而海军的职责是“在海岸的外围形成对陆地防御的纵深防御带”。^[32]由于这种以防御为主的海军战略势必导致在战术选择上“将可用的兵力配置在为数众多的易受攻击之点，以此来试图保卫陆上边境，而不是将海军集中于中央

位置”^[33]寻求进攻的机会。

当“为数众多的港口防御交由海军承担，经验证明，在这些港口之中的海军势必一再被分散”。“假如将海军分割到如此程度”，面对强大的具有战术集中效能的进攻性的远洋海军，被分割为互不统属的小型舰队的“海军将毫无用处”。^[34]因此，“用于单纯防御的海军，几乎等于发展为数众多小型舰船的海军政策，亦即炮舰政策。”^[35]炮舰政策的直接后果是海军军备发展与追求外海和远洋控制权目标脱节，因为“海军兵力的突出特征乃是机动性，而消极防御的突出特征则是固定性”。^[36]这种将海军作为消极防御工具使用的结果是“彻底抹杀了海军的战略优势”。

虽然“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通过其对海洋的控制，便可防止入侵”的战略是海军应当执行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战略职能”，但是，“战争中防御的存在是为了进攻能够随意进行”，海军的本来职责在于其展开的攻势活动。^[37]对于海权实现而言，过分强调海军战略的防御目标本身意味着对海外利益的忽视和对领土周边以外的海权的放弃。

马汉认为，海军战略的最佳选择是攻势战略。有效的攻势战略需要三方面条件支持：即，“能够集结一支包括战舰和运输舰在内的强大海军舰队”；“能够确保将这支军队顺利投送到远洋”；“能够给予这支军队以不间断的补给支援”。^[38]为确保兵力投送和补给，攻势战略还要求凭借强大的海军占据或者夺取或者控制海军机动过程中“不受干扰的”“外部水道”、“海军整修和补给的基地”、“推进和退却战略线”。^[39]马汉指出，“控制一片海域，首先需要有一支海军，其次需要掌握一些经过适当的选择、相互间分布得当、海军以其为基地并发挥作用的据点”，“没有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能禁止我们发展海军，使它足以承担可能需要它去干的工作。”^[40]

在《未来和美国的海军》一文中，马汉直言不讳地强调攻

势战略对于美国的特殊意义。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需要的都是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我希望美国永不寻求战争，除非是为了保卫她的权利、她的责任或她的必要的利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政策可以一直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海外有着可能必须由海军去保护的利益”，那么，“我们的海军在战时除了保卫海岸，还有更多的事要做。”^[41]

马汉指出，为了美国的利益，应当注重这样一个公认的军事原则和国家间关系的法则，即：“如果我们希望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争中取得主动”，^[42]“国家不会站在子弹射程之内发出挑战”。^[43]虽然“我们寻求和平解决每一个争端。但是，这样做将使我们介入新的政治关系之中并可能引发和其他国家的严重争执，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着威慑作用而不是引发事端。”^[44]“对国家安全而言，重要的是意志以及将意志化为现实的能力，”^[45]“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关注，大力地发展它以使之足以应付未来的种种可能。”^[46]在马汉心目中，美国海军的任务在于获得并保卫国家利益所及的海权领域。

海军的攻势战略不是凭空构建的，它需要获得或者占据能够发挥海军效力的地理空间。马汉认为实现本土、中间基地和前沿海军之间有效的协同，有选择地对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岛或者重要航线附近的港口加以控制，并以之为海军推进的踏板对海军作战有极大的帮助。^[47]在马汉根据其海权和海军战略理论对美国利益进行探讨的《美国向外看》、《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战略》、《地峡与海权》三篇著作中，他特别强调了中美洲、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对美国的战略意义。

马汉指出：“一旦地峡被凿通，该地区在商业上的孤立连同其他国家对其的忽视就会一去不复返。”巨大的商业和政治

利益将集聚在这样的一个贸易中心周围。为了保护并开发自己的利益，每个国家都会在美国历来对于欧洲列强的侵入有着颇具戒心的敏感的地区寻求支撑点和影响方式。”^[48]因此，“在当前我们没有作好准备的情况下，一条横穿地峡的运河会给美国带来军事上的灾难，尤其是太平洋沿岸地区。”“由于它和欧洲之间的路线因经一条能为更强大的海洋国家（指英国）所控制的通道而大大缩短。”^[49]因为“地峡运河造成的主要政治结果将是使我国的太平洋海岸离我国的大西洋海岸变得更近，并且更容易为欧洲的主要海军力量所抵达”，同时，大西洋沿岸“和它所在的国家将不仅一起承受更多外来干预的危险，而且缺乏足够的手段去对付它们”，美国和他的“门罗主义”所划定的范围将“蒙受更大的危险。”^[50]所以，对于美国而言，“一个对海峡的控制对它来说即使不是生存的需要，至少也是充分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的国家。有谁能否认它无权对于一个对其至关重要的地区发挥决定性的影响？”^[51]

巴拿马地峡之外，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对美国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马汉指出，“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这两片水域中的每一处，都存在着一个突出的商业意义的地点，”“这两片水域合在一起，控制或影响着一侧通往这两个有着商业上的价值，因而也就有着政治上和军事上意义的中心的道路。”^[52]由于地峡重要性的上升，“欧洲列强正显示出对加勒比海据点的价值更为重视的迹象，而且正加强他们对于那些如今在其手中的地盘的控制。”^[53]由于“交通线也许是战略、军事或海洋方面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一旦他们被截断，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来说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墨西哥湾或加勒比海中所有地点军事价值的大小有无正取决于他们对于这些交通线的潜在影响”。^[54]从而，巴拿马地峡、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这几个美国周边的战略要地对美国有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地峡是加勒比地区决定性的商业和军事利益所在，并吸引着那些其